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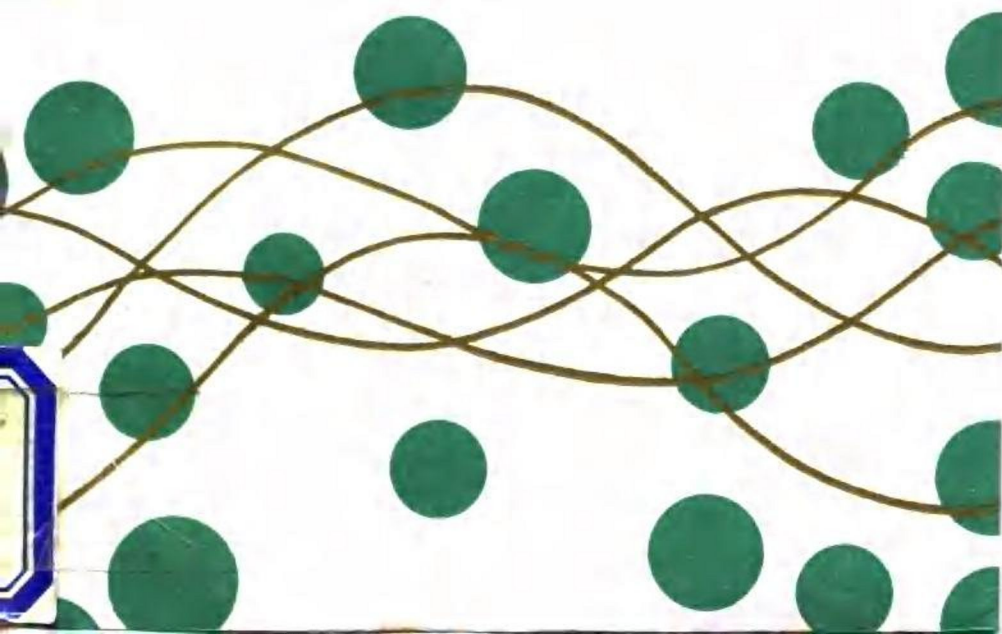
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

主 编 黄 达

经济运行中的 货币供给机制

周慕冰 著



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

主编 黄达

经济运行中的 货币供给机制

周慕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七五”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

主编 黄达

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

周慕冰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市丰台印刷厂印刷

开本：
19%

2

F·290 定价：6.40元

《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

总 序

(一)

1986年春夏之交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拟定了一批国家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是经济学重点课题之一。当时我不在北京。与会的经济学界同志推荐我作为这个课题的主持人。在此以前，我曾以《货币供给的宏观控制》这个题目取得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货币供给的宏观控制》显然不过是《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问题是有没有勇气从部分推进到整体。经与有可能构成课题梯队的有关同志商议，大家颇有信心。于是接受了这项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任务。

(二)

货币供求问题，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曾受到高度重视。当时，新生的共和国正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环境之中。在1949年这一年和1950年初，通常一两个月物价就翻一番，上涨速度十分惊

人。这种情况如果不能迅速扭转，就无法改变商业投机操纵市场的局面，生产和流通便无从转入正轨，受连年战祸破坏的经济也谈不上恢复，更不要说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造了。可以说，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巩固自己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善于打仗的中国共产党有没有组织经济生活的能力，都是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考验。在这种形势下，通货膨胀问题、货币问题，自然成为摆在议事日程首列的问题之一。1950年3月，人民政府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总题目下，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从多方面严峻紧缩通货和由中央高度集中组织物资调运、供应等措施，一举制服了延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这在当时很多国家企图摆脱通货膨胀困扰而又一时摆脱不掉的情况下，应该说的确是创造了奇迹。

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之后，随着中央集中控制计划体制的迅速建立，货币的作用日益减弱。这时，虽然我们也颇重视对现金收支的计划控制，重视财政、信贷、现金收支平衡，但从货币供求这个角度来看，所要解决的只不过是希望对已经规定的生产计划和流通计划给予货币资金保证的问题。1958年，由于要“大跃进”，要“高速度”，信用膨胀曾使大量过多的货币充斥流通并从而冲击着计划秩序。由此总结出一条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货币供给的任务不是一般地保证任何生产和流通的计划意图，而只应保证按客观允许的速度和客观要求的比例安排生产和流通的计划意图。但这样的认识，要求的仍然只是货币供给对生产和流通计划的适应，而不是把货币视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杠杆，要求它对再生产给予积极的影响。所以，多年来，除了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时期外，在经济决策的重要会议上，货币问题通常由于事实上是个次要问题而难以排入主要议题之列。

其实，即使在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货币问题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总的说来，是货币供给一直偏

多。在1953年初刚刚进入经济建设阶段之际，在1956年欢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际，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之际，都曾因过急的指导思想和不当的计划安排，造成流通中货币明显过多的矛盾。就是在其他年份，除去很少的例外，也均感货币供给偏多。十年动乱，出现了一种最为典型的隐蔽通货膨胀现象。那些年的物价看来几乎达到“绝对稳定”的境地，似乎货币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这样的境地却是靠“计划供应”、“限量供应”来维持的，即通过这些措施强制地使过多的货币不能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那时生活用品供给品种之少，档次之低，远非今日之所能设想。不过，由于对生产、分配、流通的直接计划控制，多年来，虽然有过多货币的存在，再生产过程却仍然可以进行运转。所以，在决策思想中货币问题很难受到足够的重视。

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快展开了有关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虽然不只是在理论界，而且也在决策层，明确了必须肯定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但对货币供求问题却仍未顾及，在决策思想中货币问题得不到重视的状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79年和1980年，货币供给偏多的矛盾即迅速加剧。这两年的财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巨额赤字，现金发行量和类似 M_1 这种口径的货币供给，其增长幅度均较1953年以来的年平均增长率有成倍的扩大。但那几年，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并由此带动整个经济较快地增长。同时，凭借仍然保持着的传统经济体制的控制力，调整了经济结构，适当地实行了紧缩政策。所以，货币供给虽然偏多，但市场状况仍有明显的好转。1982年甚至有了“买方市场”已经出现的判断。乐观的估计妨碍了人们正视和探索一个进入改革开放的国家在货币方面往往会碰到严重困难这样的问题。直到1984年底信贷规模突然失控才使得人们在货币问题方面开始清醒。随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概念直接出现在决策层中。经济环境这个我们用来作为总

需求与总供给对比状态的特定概括词，一时成为上上下下议论的中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在改革开放的方针下，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生活中的扩展，宏观经济问题必然会成为建设和改革中人们不能不给予重视的问题。如果说，在矛盾尚未明显暴露时，似乎只靠传统的观念、理论、措施、方法还能使我们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那么，矛盾一旦突然暴发，我们会陷入一系列新问题的包围之中。比如，我们的一系列决策将会造成怎样的经济环境？如何判断经济环境是好是坏，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能容忍的？人们能在怎样的限度内对经济环境的形成进行干预，可用于进行干预的手段哪些才是有效的？如此等等。这类问题不是可回答可不回答的，可解决可不解决的，而是必须回答，必须解决的。当然，回答与解决的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但是好也好，坏也好，都会左右整个经济进程。正是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宏观经济问题，其中自然少不了货币供求问题，无论在理论探索方面，还是在决策思想方面，其被重视的程度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梯。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接受这一课题的背景。

(三)

对于这样一个课题，有些同志已从制定宏观经济模型方面进行了探索。最初确定这一课题时，参与规划的专家恐怕不少同志也正是瞄准了这样的目标。与之相联系，那就是这样的要求：课题的成果应最后凝结为政策建议，乃至一个可以运算的计量模型。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我和参加这个课题组的同仁们确定的却是另一种目标：主要是进行理论的探索，

当然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探索。其所以如此，应该承认是由于我们这些人不善于计量模型的研究。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下的考虑：

关于货币供求问题，在理论上，似乎已是一个早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已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的实践说明并非如此。

很长时间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关于货币供求的理论，似乎用如下的观点便可全部概括：

客观经济过程，主要是商品流通过程，决定一个不依人们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对货币的需求量；

组织货币供给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对货币的客观需求；

如果货币供给符合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就将获得理想状态的货币流通，它将不会对价格水平的升降给予压力；这种状态的货币流通，也只有这种状态的货币流通，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

根据这样的观点，显然，应该做的，首先是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客观经济生活到底需要多少货币；然后是尽一切努力按照这样的需求不多也不少地供给货币。如果说我们有货币政策的话，这就是其基本思路。

上面的概括也许不十分准确，但大致轮廓恐怕不会有大的出入。似乎这已是终极的真理。需要探讨的已不是理论概括的本身，成为问题的只不过是我们怎样才能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客观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如何才能尽可能接近地按照客观需求向经济生活提供货币。比如，1956年关于现金沉淀是否构成对货币需求的讨论，60年代初关于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应该如何具体展开的讨论等，属于前者；比如从1956年开始的“三平”、“四平”的讨论等，则属于后者。

应该说，以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理论为指导，我们在调节货币流通方面的确做出了成绩。1950年初的制止通货膨胀靠的就是

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当然，在中央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形成之后，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理论并未阻止住货币供给的偏多以及其中某些年份货币供给的过度膨胀。但是每当货币供给过度膨胀的矛盾出现，也正是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理论促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决策上的失误，并促成失误的纠正。至于一般年份货币偏多的困扰也绝非导源于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理论，恰恰相反，正是这样的观念、这样的理论促使人们从体制、从整个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探寻病根——到底是什么更深层的原因使得货币供给不要过多这样简单的要求竟然如此难于实现？

问题只是在于，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理论，对于指导货币政策来说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充分的。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在那种体制下，没有足够的现实矛盾推动我们去思考，即使就是在当时，这样的观点、理论也并非是完全充分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货币问题纷至沓来，这才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投向货币供求问题上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天地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取得的成就很难使自己满意；对于马克思以后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的探讨，特别是从30年代开始在这方面的发展，由于采取了简单摒弃的态度，除了专讲西方经济学的少数专家外，几乎不怎么了解。而现实经济生活却要求我们回答一连串过去很少思考的问题。

比如货币需求是否只是商品供给的函数？象利率、通货膨胀（或物价波动）预期等是否也是这个函数中的变量？

它是否总有一个确定的量，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握它？还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确定的量，而只是一个区间，是一个模糊值，或只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状态？它是只有一个唯一的解（不管这个解是一个点，是一个区间，是一个模糊值，或是一种“状态”），还是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解，甚至无解？

它是一个完全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客观范畴，还

是经济行为主体（如个人、企业、国家）的主观意志必然参与其中的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范畴？如果是后者，它是否已丧失作为一个客观标准的意义？

再如货币供给。在我国，政府部门只把它理解为现金的增减。面对改革开放的形势，这种观念无疑必须突破。但口径逐层扩大的货币供给，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界定为宜？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难于采用世界通行的 M_1 、 M_2 以及流动性资产等这样的口径？

为了使货币供给符合经济建设的要求，应该怎样设计货币供给的机制。由中央一个机构对货币供给进行直接的、具体的控制，如改革以前的办法，显然无法适应改革以后的经济形势。那么，随着银行体制的改革，怎样的货币供给机制才能使货币供给更有利于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或者换个角度说，为了使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货币供给机制得以成立，银行体制的改革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对于货币供给国家应予控制似乎没有绝对否定的观点，但人们是否有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它进行控制，还是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左右？换个提法，货币供给是一个纯外生变量，还是也具有内生变量的性质？

再进一步，就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来看。没有对货币的需求，也就根本不需要货币供给。从这点来说，需求是主导的，供给是为了满足需求，是被动的。但货币供给所能做到的是只能对需求消极地适应，还是也有可能能动地给予影响？

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适应与否如何度量？是否零通货膨胀率是唯一的度量标准？如果物价水平的升降有非货币因素存在，是否其衡量标志本来就不应只限于物价？

还可再进一层，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否只在于追求一个基本不变的物价水平？这几年更通常地是从社会总需求（这是货币供给

的函数)与社会总供给(对货币的需求是它的函数)的对比状况,也就是从我们习惯称之为“经济环境”的状况来提出问题的,即货币政策应该追求创造一个怎样的经济环境?是否如1985年我们曾提出的供略大于求的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最理想?如果说这样的环境是理想的,那么,在处于转轨时期的经济中要有怎样的前提才能实现?这些前提有否可能现实地存在或有否可能现实地创造出来?事实上还存在另一种考虑:求略大于供是否必定给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如果并非必然,那么有没有必要以牺牲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有益的进展来换取供略大于求的宽松环境?还有一个敏感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问题,也许更不易捉摸。曾经只接受零通货膨胀率的人们,逐步认为百分之一、二、三是可以接受的,不久又认为不超过两位数字是可以接受的,但终归会碰到不可超越的界限。可是,这个界限又在哪里,如何把握?

总之,过去不曾想到的问题现在迫使人们去想,而且越积越多,似乎无尽无休。当然,这些问题,其中很多一时不见得能搞清楚;有些问题的提出也许就有点模糊、有点混乱,甚至有荒唐之嫌。但无论怎么说,大量问题仍有提出来思索的理由。如果对于摆在面前的大量问题不去进行理论探讨并取得进展,我们就无法认识天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货币世界,也难以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有效地利用货币这个杠杆。

这就是我们对于从理论上探索货币供求问题有何意义的理解,也是把理论探索作为完成课题任务主攻重点的理由。

(四)

理论探索如何展开,最初我们想到三个题目:货币需求、货

币供给、货币政策。这三个方面应该包括在《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这个课题所需探索的范围之内恐怕是不需要论证的；由三位同志各自认定一个题目深入钻研下去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分工。承担这三个题目的是当时我所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对于这样的题目，他们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有所探讨；在接受这个重点课题任务之前，他们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也大体就是这三个侧面。所以，可以说，他们在分别承担这三个题目之前已经开始了研究工作，并于1988年以博士论文形式提出了成果并通过答辩；1989年经过再次加工，先后定稿。最后确定的题目分别是：

邓乐平：《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实证的考察》；

周慕冰：《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

王松奇：《货币政策与经济成长》。

然而，从范畴、从规律探索问题，很难对三、四十年来中国的实践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增添一个从理论上系统回顾我国货币政策的题目。要胜任这样的研究任务，最理想的恐怕应是几十年来一直直接接触这一工作的同志。否则，纵然有较丰富的文字材料，往往也很难准确把握各个时期的具体背景、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效果。再者，也需要有理论探索兴趣并具备在课题组内进行观点交流（包括不同观点的争论）所必要的一些共同的思路。很幸运，从建国以来一直主管现金调节工作的高级经济师、原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副司长王庆彬同志愿意承担这一任务，并请周升业教授作为他酝酿思路和经常交换意见的搭档，请目前主管货币流通工作的段引玲同志撰写部分章节。1987年开始着手研究，现正处于成书的写作过程之中。题目定为《中国货币流通的回顾与展望》。

除上述四个题目外，我们觉得还应有第五个题目，那就是系统考察自建国前后以来我国银行管理的具体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搞清不同管理办法下货币供给的具体调控机制，然后从货币

供给角度对银行管理制度的设计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评价。题目的名称初步考虑定为：《新中国的银行管理与货币供给》。

与前面四个题目比较，这个题目似乎稍嫌具体了一些。但银行管理的具体规章制度直接决定货币供给调控机制的特点；不懂得前者而却议论后者，那是可笑的。然而，不要说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就是以讲货币银行学为业的学者，恐怕也往往会程度不同地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中。通过这一题目写作思路的讨论，我就发现自己对有一些情况不了解，有一些情况则知道得很不准确，参加讨论的其他同志也感到获益匪浅。研究这样的题目要查阅很少被人光顾的历史档案；有些问题单凭文字材料搞不清楚，还要采访一些老同志。工作是艰苦的。但如能成功地把这一看似具体的管理问题，从建立宏观调控机制的角度引入金融理论的殿堂，这点艰苦与其可能的贡献来比就算不了什么了。主持这一题目的是吴晓灵同志，罗兰波同志作她的助手。晓灵同志完全了解，取得一位多年参与银行领导工作并真正熟悉银行业务、政策和理论的老同志的支持对这个题目有关键意义。所以她请了一位顾问——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同志。这个题目的完稿时间约在1990年下半年。

大体看来，这五个题目还是成体系的。不少帮助我们推敲思路、观点的同行对这个体系基本赞成。但大家又都感到，这成体系的一组研究题目最后能否为总的课题提供一致的结论和建议却大成问题。的确如此。先看前三个题目。一开始，当三位博士生说明自己研究计划时，即可看出，具体的探索途径和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存在着颇多的差异。自然可以设想，时时协调彼此的观点，消除差异，以求统一。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会阻碍每个人思路的扩展和深入，最后“统一的”观点也许可以形成，只是很难避免缺乏创见的命运。所以，我们讨论的一致意见是只能有取有舍：舍最后拿出观点必求统一的唯一成果，如一本学术专著或一

组统一政策建议这类的考虑，而取有利于深入理论探讨的安排——结合博士论文，各自形成专著，不怕观点有异，而要力求深入思考。如果说，三位博士生的题目还是一类，即都是就范畴进行理论探讨，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那么，按历史事实的顺序进行理论回顾的后两个题目，其研究成果中的观点与前三个题目研究成果中的观点有所不同就更无足为奇。不仅题目类型不同，写作者的经历、工作岗位以及观察问题的角度也有明显区别。这样，在一个课题内部就会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曾有这样的建议：是否由课题主持人写一本能综合五个题目研究成果的书。这个建议值得考虑。但是，需要时间自不待言，而且能否成功也不肯定——也许综合的结果不是提高，而是不得不把一些有见解的观点抹掉锋芒甚至干脆舍弃。而且，从理论探索的目标来说，并存着不完全一致的观点和不完全一致的政策建议未尝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对于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的角度来看，一致并不一定比不一致更有权威，而不一致或许比一致更有启发。

一个课题的成果是几本书，而且观点并不求完全统一，相应的，文风也不会一致，这也算是一种格局吧！

(五)

虽然围绕货币供求问题，课题组的同志之间肯定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对一些基本问题在思路、见解上的一致较之具体观点的不一致更占主要地位。

必须严肃、认真对待重点课题这一国家任务，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完成这一任务，是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共同认识。这样的共同认识，基于我们这些人对货币金融理论的强烈兴趣，基于我

们这些人希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建设添砖加瓦的长期心愿——虽然在金融领域中我们是分别处在实际工作、宣传工作、研究工作、教学工作等不同的岗位上。

要为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建设作出点贡献，就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用马克思著述的一些论断——在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这样的论断是很多的——并不困难，但这并不等于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已是人们的共同见解。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贯彻到研究全过程的始终，这无疑是很不轻松的任务。特别是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控制的研究，我们积累的经验并不多。这样，我们要摸索，要开拓，可能成功，也可能走弯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强烈的批判精神、革命精神、进取精神要求我们明确，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面对现实所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在努力深化认识的进程中绝不要因为取得点滴进展而自我满足，也绝不要因为可能碰到的困难望而却步。只要我们坚持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态度，我们的工作总会是有意义的：在得到肯定评价时，说明我们推进货币金融理论建设的努力是有了贡献；即使出现暂时的失误，我们的努力也不会白费，它可使别人由此得到借鉴。

研究货币供求，如果以传统的计划体制为给定的背景似乎比较简单，如果以发展商品经济和运用市场调节为给定的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如何对待西方经济理论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经济学界的同行都知道，在货币供需问题上，西方经济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是不能漠然视之的。也就是说，虽然问题敏感，不易把握，却又难以回避。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给我们早就做出了榜样。马克思所创建的经济理论体系，我们认为——也许我们表达得不确切——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的形成正是吸取了人类精神成果加以批判综合的结果。遵循马克思治学之

路，这个体系的发展必然是继续对人类精神成果加以批判综合的过程。假如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对任何其他精神成果应该一律采取排斥态度的封闭系统，那实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否定。本着这样的理解，就货币供求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必须努力真正了解多年来事实上被我们自己放在视野之外的各种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甄别、选择、综合、吸取。在这里，我们强调两点：其一，要想真正了解，就要踏踏实实搞清各种理论的本来含义，弄通它们的发展脉络，反对抓住一些名词、术语，强不知以为知；其二，对于刚刚引入的理论和学说，往往容易轻率接受、盲目赞同，这种在近年的经济研究中屡见不鲜的倾向一定要时刻注意防止。当然，这是我们给自己确定的应该努力遵循的原则。至于做得如何，我们自己也要不断地再估价。

课题组还有一些意见一致的考虑，是有关理论与实践必须结合方面的。

一方面是都不赞成理论研究中那种对具体经济过程不甚了了但却不断进行抽象逻辑演绎的学风。马克思论述经济问题时所采用的严密思辨的形式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但他对于一些具体业务技术问题刻意求知、一丝不苟的态度同样令人起敬。他在研究折旧问题时，曾向恩格斯请教，要求恩格斯的答复不谈理论，纯粹谈实际。恩格斯根据生活实际给他列出的几串数字无疑印证了他关于折旧与积累关系的论点。然而，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做到这一点却不简单。特别象货币需求模型、货币供给机制、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的传导机制这类问题，而且又由三位那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现在已成博士的同志分别研究，很容易陷入抽象推理的偏向之中，这并非杞人忧天。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不论以多么抽象的形式表达，任何论断都要以有无实证材料的支持来检验。

另一方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课题尽可能地密切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的合作。通常的情况：理论文章是理论文章，经验总结是经验总结，文体迥然不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思路难以交流则显然是不利的。在这个课题中我们努力使两方面的同志围绕一组相关的题目分担任务，从而交流心得，交流思想，促使分力形成尽可能大的合力。同时，又邀请两方面的同志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进行评论。在开始研究写作计划时，我们邀集了一次这样性质的会，在讨论五个题目的写作提纲时邀集了第二次这样性质的会。今后还准备组织两次：一次讨论后两个题目的写作初稿；一次讨论整个课题完成后怎样进一步前进。借此机会，在这里，对与会帮助我们研究的所有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也许正是上述这些基本思路和见解的基本一致，是鼓励我们尽力完成这一国家课题任务的保证。

黄 达

写于1990年元旦，第一本专著《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实证的考察》发排前夕